

110 YEARS
大公報
一九〇三年創刊於香港大公報
110周年

「灰色通草帽，灰藍色的中山裝，蓄髮，似乎與慣常見過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寬大得很。」1945年8月29日的《大公報》，以這樣細膩的筆觸描述毛澤東在重慶的首次亮相，「他的手指被紙煙燒得焦黃。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我看到他的鞋底還是新的，無疑的，這是他的新裝。」

彼時的中國，瀰漫着一種既亢奮又迷茫的複雜情緒。日本戰敗，二戰結束，中國大地雖遭浩劫，但元氣尚存，似乎復興的曙光已刺破黑暗，朝陽即將噴薄而出。萬眾期盼之中，一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國共談判在重慶上演，在這至關重要的歷史拐點上，《大公報》有幸成為見證者、記錄者，甚至某種程度上的參與者。

本報記者 鄭曼玲



▼抗日戰爭勝利後，為爭取國內和平，毛澤東親赴重慶談判。圖為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在延安機場向歡送的軍民揮帽告別



▲1945年8月29日大公報刊出毛澤東抵渝的消息及相關社評

大公報 見證重慶談判風雲

1945年8月28日，一向多霧的重慶卻是個大晴天。

剛過中午，《新華日報》採訪部主任石西民坐着吉普車，風風火火地來到《大公報》記者王淮冰家。石西民告訴王淮冰：「毛澤東和周恩來下午要到重慶了。」約他一起去採訪。

得知這個消息，王淮冰喜出望外。那幾天，他與重慶新聞界的朋友們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毛澤東會不會冒險來重慶與蔣介石和談。正反兩方，各執一詞，似乎都有一番道理。沒想到，議論正酣，毛澤東已經率團飛到重慶了。

「毛澤東先生來了」

王淮冰坐上石西民的吉普車，一路向機場飛奔，沿途又接了《大公報》記者彭子岡和《新華日報》記者浦熙修，最後當郭沫若、于立群夫婦上車時，一輛小小的吉普車已擠滿了人。

「僵持八年，令全國非常焦急關注的國共團結問題，已因中共領袖毛澤東飛臨陪都而開朗。」王淮冰後來回憶，他的這句新聞導語，就是在這輛悶熱擁擠的吉普車中構思出來的。

當王淮冰等人走進候機室時，發現各黨派人士早已守候多時了。民主同盟的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等幾位老先生，不時伸着脖子向遠處張望，急切之情溢於言表。相比之下，前來迎接貴賓的國民黨官員周至柔、邵力子等人，卻顯得有些心不在焉。

那一天，九龍坡機場上，沒有口號，沒有鮮花，沒有儀仗隊，但幾百個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卻都知道，這是關係中國歷史和人民幸福的一個重要時刻。

下午3點37分，經過三個多小時的飛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專機迴旋到人們的視線以內，草綠色的三引擎巨型機終於安然著陸。為了捕捉這個難得的歷史場景，上百名記者像打仗似的蜂擁而上，照相機的咔咔聲不絕於耳，鎂光燈閃成一片，就連警衛也一面維持秩序，一面沒忘了對準他自己的鏡頭。

第一個出現在飛機艙口的是周恩來，一如往常穿着那套淺藍的布制服，他的重慶朋友們率先鼓起掌來。到毛澤東、赫爾利、張治中一齊出現時，掌聲與歡呼聲齊作，延安來了九個人。

時年52歲的毛澤東出現在人們的眼簾，「灰色通草帽，灰藍色的中山裝，蓄髮，身材中上，衣服寬大得很。」《大公報》記者彭子岡覺得，毛的形象似乎與慣常見過的肖像並無兩樣。

記者們把毛澤東團團圍住，有的提問，有的遞名片，有的搶着握手。一干民主人士卻被擋在外面。年老、個小的沈鈞儒，在人群外急得直跺腳，一邊擠一邊喊：「我是沈鈞儒，我是沈鈞儒！」

親自把毛澤東接到重慶的赫爾利看到這番情景，非常滿意，他撫着八字鬚悄悄在毛澤東耳邊說：「簡直像在荷里活。」

他「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

「很感謝。」毛澤東幾乎是用「陝北口音」說着這三個字，當記者與他握手時，他仍在重複這句話。彭子岡留意到：「他的手指被紙煙燒得焦黃。當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時候，可以看到鞋

底還是新的，無疑的，這是他的新裝。」

機場短暫的亮相之後，毛、張、赫、周四個人坐了美大使館二八一九號汽車去張治中公館小憩。記者像追看新嫁娘似的追進了張公館，郭沫若夫婦也到了。「毛先生寬了外衣，又露出裡面的簇新白綢襯衫。他打碎了一隻蓋碗茶杯，廣漆地板的客廳裡的一切，顯然對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來自鄉野的書生。」

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所捕捉到的這些不為人知的細節，被彭子岡寫進了《毛澤東先生到重慶》的特寫，刊登在第二天的《大公報》上，成為至今膾炙人口的名篇。

當時，毛與郭沫若仔細談着蘇聯之行。彭子岡問他對於中蘇盟約的感想時，毛澤東說：「昨還只看到要點，全文來不及看呢。」彭又追問他此次談判是否會涉及「黨派會議與聯合政府」的議題，毛指着他下飛機時發表的中英文書面談話說：「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裡了。」

對於留渝時間，他說不能預料。他翻看重慶報紙時說：我們在延安也能讀到一些。他盼望有更多的記者可以到延安等地去。隨後，張治中報告說，蔣介石將於當晚八時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諸先生，因此張公館趕快備辦過遲的午宴，想讓毛先生稍事休息後再赴宴，作全世界所關心的一個勝利與和平的握手。

儘管蔣介石指示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對此事低調淡化處理，不要替共產黨製造聲勢，毛澤東單刀赴會的消息還是像驚雷般在重慶上空炸開了，以「文章報國」為己任的《大公報》就給了濃墨重彩的報道。與彭子岡的特寫一起見報的，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左二）及周恩來（右一）飛抵重慶



▲1945年重慶各界歡迎毛澤東

▲大公報刊出毛澤東抵渝的消息，與彭子岡的特寫一起見報的，還有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的社論《毛澤東先生來了！》

還有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的社論《毛澤東先生來了！》。

他在文章中興奮寫道：「現在，毛澤東先生來到重慶，他與蔣主席有十九年的闊別，經長期內爭，八年抗戰，多少離合悲歡，今於國家大勝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團圓！認真的演這幕大團圓的喜劇吧，要知道這是中國人民所最嗜好的！」這段文采斐然、激情洋溢的文字，不但充分表達了《大公報》對毛澤東來渝以及由此開始的國共和談的喜悅之情，而且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人民的心聲。

吳鼎昌提議國共談判

對毛澤東來渝談判反應如此之熱烈，皆因《大公報》是最早提出蔣、毛會晤建議和得知重慶談判消息的新聞媒體。早在1941年5月23日，《大公報》在社評中就提出，為解決國共之間的摩擦，達到「誠意合作」之目的，「最好毛澤東先生能來重慶，與蔣委員長徹底討論幾天」，以對國家前途的基本認識達到一致的諒解。當時《大公報》的提議沒有引起任何反應。四年後，當蔣介石出人意料地向毛澤東發出第一封邀請電時，《大公報》又成為了最早得知這一驚人消息的新聞媒體。據王芸生回憶，時任國民政府文官長的吳鼎昌在向蔣介石提出並代擬了邀請毛澤東赴渝談判的寒電（8月14日）後，為了給他曾任社長的《大公報》一條特大獨家新聞，遂於15日晨將蔣之電稿交給《大公報》，準備在當天晚報上發表，孰料在檢查時被打。

雖然未能如願搶發消息，但《大公報》還是在當天社評中用充滿激情的語句論及了蔣之電報：「在我們欣慶勝利到來之時，國內也有一個令人興奮的新聞，就是，蔣主席致電毛澤東先生，請其克日來渝，共商國事。這真是令人興奮欣慰。」「蔣主席既胸誠相邀，期共商討；毛先生自然也應該不吝一行，以定國事。」「忠貞愛國的中國人，都在翹待毛先生的惠然肯來了！」顯然，《大公報》不僅對蔣之電報興奮不已，而且急盼毛澤東能夠應邀來渝。

8月20日，蔣介石二電延安，對毛澤東「再馳電奉邀」。次日，《大公報》在要聞版頭條位置報道了此事，並在當日社評中以滿懷喜悅與期盼的心情指出：「這一星期來，人人為勝利歡欣，也人人為團結懸念。」「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國家之大計。」為了能使毛澤東早日啟程赴渝，《大公報》還建議重慶各界不要發表「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論與宣傳」，以「保持一個能使毛先生到來的空氣與環境」。

毛澤東為大公報題詞

滿腔報國情懷的王芸生，清晰記得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抵渝後一周左右，在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雞尾酒會上，當有人介紹毛澤東與王芸生相識時，毛澤東緊緊握住王芸生的手並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希望你們新聞界的朋友多為和平而宣傳。」王芸生連連點頭，並稱一定盡力。

9月5日下午三時許，在紅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辦事處，毛澤東又與王芸生、《大公報》編輯主任孔昭愷、採訪主任王文彬會談了三個小時。王芸生回憶道：「毛澤東很健談，談話時好像旁若無人似的。」毛澤東還特意將王芸生等留下吃便飯，由周恩來與王若飛作陪。飯後，毛澤東親自安排車把王芸生等送回報館。次日，9月6日，《大公報》在第二版以大標題《毛澤東對本報記者談，願團結商談早獲結果》發表報道。

9月20日，仍然在紅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辦事處，毛澤東與王芸生等再次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對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團結」的口號，彼此都談了看法。王芸生反覆強調，希望共產黨方面以團結為重，共同建國，不要把國共聯合的局面丟掉。毛聽了後，頻頻點頭表示贊同，並反覆強調「和為貴」。返回報館後，王芸生以《大公報》名義發出請柬，在李子壩報館設宴招待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應邀出席。

宴會進行中，王芸生向毛澤東建議：「共產黨能否不要另起爐灶。」毛澤東答道：「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心裡不許我們造飯。」宴會結束時，毛澤東還為《大公報》職工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毛主席當時是作為貴賓出席《大公報》宴會的，當時我與他已有



▲彭子岡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捕捉了毛澤東抵渝時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



►大公報著名記者彭子岡

好幾次交往，自始至終，十分友好，毫無嫌隙。」王芸生後來回憶。

重慶談判後期，內戰烏雲密布天空，局部已聞槍聲。比較敏感的王芸生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他專門拜訪了章士釗先生，提出應暗示毛澤東「三十六計走為上」。兩人不謀而合，最後由章士釗向毛當面提出。據說，此事成了毛澤東在1957年保王芸生不劃為右派分子的原因之一。

和談期間還有一次，周恩來到了李子壩王芸生家，兩人並沒太多的寒暄，談的多是國事的展望，對和平建國很有信心。這時，走進一位扛着布口袋和一匹呢料子的警衛。周恩來說：「這都是從延安帶來的小米和紅棗以及在延安織的料子，請你收下吧！」王芸生十分感謝周恩來的情意，將小米和紅棗收下了，而將呢料子退回。他說自己曾立下過規矩，從不收任何人的禮物，所以呢料退回，請周原諒。周恩來是個通情達理之人，便笑咪咪地收回了。

社評對和平不「輕下斷語」

四十三天的談判，最終未能達成人們期待的成果。10月8日晚，毛澤東在張治中的歡送宴中致辭，短短的講話中八次使用「統一」一詞。次日的《大公報》作了詳細報道：「毛先生說『和為貴』，只有和，才能求得雙方的一致。和是大多數人的願望。我們要用的國家迎接新局面。最後毛先生像咆哮般的大喊：『新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此後，毛的這句口號曾引起史界爭議。王芸生卻認為，這是毛澤東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的願望，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一種表述。

兩天後的10月10日，國共兩黨簽訂了《雙十協定》。與兩黨機關報的積極評價相比，《大公報》在肯定會談成果的同時，卻清醒地表示出相當的擔心。其社評《團結會談的初步成就》中寫道：「我們檢讀《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一過，思緒起落，雖百感交集，卻一時難以一言說出滿意或失望。我們實在對團結會談太關切了，也太矚望了，所以此刻讀到一字一句的正式發表，只覺有極大的希望，而不必輕下斷語。」

10月11日，蔣介石與毛澤東共進早餐，毛澤東於當天返回延安。他在登機前向中外記者發表了簡短談話，指出：「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然而，當天夜裡，蔣介石輾轉難眠，在日記裡寫下「甚嘆我黨之不可與同群」，表達了他準備與中共毛澤東決裂的決心。

此後，中國歷史進入另外一個拐點。《雙十協定》墨跡未乾，烽火已然。